

■ 学人文库

或曰寄所
遇難得
魏舍萬殊靜

魏晋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

卫绍生 闵虹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学人书序

晚清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

陈国治 周 凤 著

或曰寄所託
於舍萬殊靜
於所遇難得

■ 学人文库

魏晋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

卫绍生 闵虹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卫绍生, 闵虹著.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9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103 - GH - 750
(学人文库)

ISBN 7 - 5348 - 2511 - 3

I . 魏… II . ①卫…②闵… III . 古典文学—关系—政治—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 I206.2②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1910 号

责任编辑:张燕萍

责任校对:维 思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10.125

字数:227 千字

版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 - 5348 - 2511 - 3/I·851 **定价:**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卫绍生

(1957~), 河南项城人。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郑

州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已出版《文化视野中的陶渊明》、《神秘文化与中国人》、《三国启示录》、《三国演义与人才学》等学术专著十余种, 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主持(或合作主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项。



闫虹

(1958~), 1982年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主编, 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 从事中

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卷)、《中国古典小说的人文精神与艺术风貌》(合著)等, 发表《论〈三国演义〉人物形象的定型化》、《魏晋文人自风流》、《风流自赏 情兼雅怨——曹植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处境》等文章三十余篇。

学人文库

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	14.00 元
周秦时代理想国探索	14.00 元
秦汉史探讨	16.00 元
明代行政管理制度	18.00 元
明代目录学研究	19.80 元
文选学新论	19.80 元
文化视野中的陶渊明	18.00 元
唐宋词体通论	9.00 元
岑参事迹著作考	11.00 元
明清传奇结构研究	20.00 元
中国服饰史稿	19.00 元
周公事迹研究	18.00 元
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	28.00 元
走向近代化	
——清嘉道咸时期中国社会走向	21.00 元
河南历史名人籍里研究	30.00 元
赤壁之战研究	24.00 元
九品中正制略论稿	20.00 元
魏晋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	20.00 元

前言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论语》、《诗大序》等早期古代文献中,已经有过相当精彩的论述(尽管它们论述的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但论者仍习惯上溯源到那里),事父、事君,兴、观、群、怨,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诸说,皆是有意强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和教化民风世俗的作用,对文学进入社会、求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对文学的发展、普及和繁荣,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非常重视以政治、政权为主的上层建筑对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强调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论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强调政治对文学的主导作用,和文学服从服务于政治,主张文学家应该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些思想观点对我国近百年来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已经影响并将继续影响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

从社会历史发展进化的角度而言,政治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文学无论创作、批评还是欣赏,都更多地属于精神、思想、文化的层面,而精神、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的或政治的

因素,而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更多地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而正是其自身的特殊性,给人们认识和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造成了很大的难度。不知是因了这一原因,还是不太瞧得起文学,中国封建社会的当权者即使是在文学走向独立之后,在文学已经成为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的时候,也很少明确对文学提出要求,相反倒是一些文人不时地从各自的角度、各自的立场和各人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诠释和注解。

自文学从人们的观念形态中独立出来以后,自文学创作作为文人的一种自觉行为之时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不是以某种固定不变的形态而出现,文学与政治始终如同两个初恋中的情人,关系的好坏,亲和度如何,多数情况下不是由某一方单独决定的,而是视双方对二者关系的认可程度而定。任何一方的过分主动,如果不能取得对方的积极回应,都只能说是单相思,对二者的关系不仅不会有太大的促进作用,甚而会有反作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没有一个固定的状态,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看待,而应用发展的眼光、辨证的眼光去审视,去评价。

社会的发展,政治的变革,文化的建设,有平和的,亦有激烈的,有渐进的,亦有突变的……文学的发展变化,有时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相一致,有时则不太一样。而且,不论是就一般意义而言,还是就历史经验而言,不一致的情况占了大多数。因为,文学的发展演变,不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而且更多地受社会思潮、时代风气、正统思想、道德伦理、文学观念、文化氛围等大文化环境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大文化环境的影响比某种强权政治的影响还要强大,还要深远。

鉴于这种情况,考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仅要循着社会

发展的线索和政治变革的轨迹，而且要考虑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学发展演变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更容易看清影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各种因素，因而也就比较容易接近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本质。好比看庐山，置身庐山之中，触目所见固然都是庐山，但毕竟只是庐山的某一景观。若想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和把握，就要有全局观，要能跳出庐山对你的束缚，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笔者选择从魏晋时期切入，把魏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放在大文化的视角和层面，加以考察和观照，看一看二者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发展状态，怎样发生相互影响，又怎样影响当时的社会文化。这不仅对魏晋文学研究，而且对准确理解和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都显得很有必要。



从文学的自觉时代算起，文学已经有了近二千年的发展历程。如果从萌芽时代算起，文学走过的路程就更加漫长了。因此，要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和描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显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本文只好作了一下选择，截取一个历史断面，把时间限定在魏晋时期。

之所以作出如此选择和限定，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魏晋时期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代表性。这一时期，无论是历史演进，朝代更迭，社会变革，还是政权架构，政局变化，党派斗争，抑还是个性意识的觉醒，学术思想的发展，文化精神的建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非常具有典范意义。

就社会政治变革而言，中国社会除正常的程序性演进之

外,不外乎战争、动乱、党争、篡权、禅让等几种形式。而魏晋时期虽然就其时间而言尚不及二百年,但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却可以把整个中国历史浓缩进去。这一时期包括了汉末大乱、天下三分、正始党争、晋承魏祚、三国归晋、太康之治、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晋室偏安、经略中原、南北分治、晋末大乱等等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国家有分有合,社会有治有乱,政权有篡有禅,有一统之争,亦有偏安求全。

就封建政治统治而言,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最为惨烈的时期之一。尤其是正始时期和永嘉前后,政治之黑暗,统治之严酷,党争之惨烈,皆为中国历史所罕见。这一时期,文士生活在政治斗争和党派之争的夹缝中,心灵和精神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束缚和压抑,许多人不得不被动地回归自我,给思想戴上面罩,给精神穿上铠甲,他们的社会文化行为因此而发生变形和变异,并有力地影响了一个时代,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和文化观念。

就思想领域而言,汉末儒家思想统治的崩溃,促进了各种思想学说的发展和流行,佛学的东渐,道家思想的流行,玄学的炽盛,名教的盛行,以及各种合时宜与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都粉墨登场,使魏晋时期出现了继战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客观上催化了魏晋时期个性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全社会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认识,促成了魏晋风度的形成。

就社会风尚而言,名士们崇尚玄理,以谈玄清议为高。在生活上,他们注重仪表风度,纵情任达,饮酒服食,喜好仙道,并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时尚被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千古以来,聚讼纷纭,是是非非,莫衷一是。

这一时期另一显著特点,这就是名士集团的大量出现。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谈玄清议之风的流行,品评人物成为时尚。名士出于不同的目的,有意无意地结成紧密的或松散的利

益集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以何晏、夏侯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由于介入了曹爽与司马氏集团的党争而被杀戮殆尽,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则为躲避政治斗争而纵情世外,至于以王衍、乐广为代表的中朝名士则由于一味谈玄务虚而招尤,有“神州陆沉,王夷甫等人难辞其咎”之议。有些名士集团虽然表示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名士集团大都成为当时社会重要的政治力量,成为党派斗争争取或镇压的对象。名士集团的出现,有力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文化观念,对魏晋文化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是魏晋时期文学开始从经学、哲学、史学中解放出来,进入了自觉时代。在文学尚处于附庸地位,尚未真正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门类的时候,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很有一些文不对题的味道。因为此时的文学尚不足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不具有单独与政治对话的资格,而且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也不是通过作家、作品和文学批评来实现的。只有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在文学成为具有独立资格的门类之后,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才可以说是对象清楚,论题明晰,才能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梳理探讨。而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使文学具备了这样一种资格,即文学可以独立地和政治对话,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已经可以独立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

魏晋文学在进入自觉时代走向独立以后,受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发展演进一波三折,其与政治的关系也因所处时代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具体而言,可分为四个时期,四种状态。

一、亲和期。汉献帝建安至魏明帝景初年间,社会政治由乱而治,建功立业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曹操统一北方

后,尚法术,崇事功,务通脱,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治的基调。和这一基调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有识之士建功立业的抱负,积极进取的精神,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刘勰描述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这一时期,产生了以三曹、建安七子、蔡琰为代表的作家群,出现了许多以“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为主要特色的史诗式的作品。自曹丕称帝至曹睿去世,社会处于由乱趋治的过程中。这一时期的作家以曹植为优秀代表。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积极用世、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基于对这一时期及其前文学的作用与价值的认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著名主张,把包括文学在内的文章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正面肯定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二、磨合期。自魏齐王曹芳正始元年至司马炎称帝,政治腐败,政局混乱,党争不断,许多士人不得不在忠于曹魏还是依附司马氏之间进行选择,中国社会出现了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最黑暗”的时期。而司马懿父子的“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更增加了政治的变数。这种政治局势促成了两大名士集团的形成,一是以何晏、王弼、夏侯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一是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前者以谈玄清议为能事,自觉不自觉地介入了正始党争;后者以任性纵情为特色,有意识地远离官场,远离政治,以求明哲保身。二者的结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备受关注的“魏晋风度”。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以“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为主要特色的建安风骨的悄然隐退,代之而起的则是玩味老庄义理的玄言诗,寄意遥深的咏怀诗,借史咏怀的咏史诗,刘勰称之为:“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文心

雕龙·明诗》)这一时期,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最为彰显。在政治高压下,文学由第一阶段的衷情于政治,不得不转向敬而远之,或虽有寄托却也只有选择隐晦一途了。政治以其强力影响着文学,而文学却表现出明显的弱势状态,只能以其微弱的声音来折射当时的政治了。

三、疏离期。西晋时期,司马氏取得政权时的尴尬,客观上造成了其政治上的两难境地。巩固政权需要提倡忠义,但由于他们的政权是依样画葫芦篡夺而来的,这就使得他们不能在“忠义”二字上唱高调,于是便只好祭起“孝”的旗帜,所谓以孝治天下。而事实上,司马氏政权在政治上则始终处于政失准的、依违两端的境地(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对此有很精到的论述)。受此影响,士无特操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晋世不文”成了一个时代的特色。除了一些为当权者需要的颂章之外,文学不太受当权者的重视。这固然少了有力的扶持,但在当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文士不必担心何晏、嵇康等人的悲剧重演,可以较为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创作,“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驰骋艺术想像,挥洒艺术才能。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并骋于文坛,出现了“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盛况。这一时期的文学盛则盛矣,但是,许许多多的文人“采缁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有意识地“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注重情采辞章,与政治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所以,这一时期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远不及第二阶段,文学对政治的作用越发显得无足轻重。

四、回归期。东晋时期,元帝中兴帝业,偏安江南,政治上虽欲有所矫正,但积弱既久,积弊已深,方方面面积重难返。加之朝中内哄不断,重臣接踵相叛,东晋的政局长期处于动乱之

中,恢复中原始终是一个为人乐道却又难以实施的话题,谈玄清议之风依然盛行不衰。在这种大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文学一方面有意识地与政治若即若离,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向政治靠拢,出现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表现民族矛盾的作品,如郭璞的《流寓赋》、《答贾九州愁诗》,孙绰《与庾冰诗》等。但这类作品没有能够形成主流,也没能对当时的主流文化产生太大的影响。政治对文学似乎没有多少热情,文学对社会政治也少了应有的激情,终于造成了文学与政治的隔阂,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玄言诗、游仙诗的炽盛,田园诗、山水诗的兴起,和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一代诗风文风的流行。刘勰所说的“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东晋的诗风文风。陶渊明的出现,使文学更加关注自然,关注人生,走向了回归自然与回归自我的双重回归,标志着东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晋时期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小说,采街谈巷语,录琐言屑语,搜奇志异,博物调谑,和政治距离就更远了。

魏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虽受当时的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以政权架构、政局变化、党派之争为主的政治。这一时期,相对于文学而言,政治始终处于主导、主动甚至主宰地位,文学虽然已经独立,但基本上处于附庸和被动地位。不过,文学并没有泯灭自己的个性特征,也并非完全机械地被动地服从服务于政治。当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较为融洽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社会由乱而治、政治相对清明的时候,文学就对政治的召唤给以热烈的回报,文学与政治处于亲和状态,相辅相承,相得益彰;当政治不能保持其清正廉明,内耗内哄不断,形成一种政治高压局面的时候,当文人动辄得咎不得不把真实的思想情感深藏起来的时候,当文人不得不不对政治敬而远之的时候,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需要重新

整合了。这一时期既是政治的痛苦期，也是文学的痛苦期；这一状况决定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必然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政治既然无暇顾及文学，文学也不愿以泯灭个性为代价而去依附政治，充当政治的附庸。这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出现了有意无意的疏离，尤其是西晋初年和永嘉年间许多文人惨遭杀戮，更加重了这种疏离的倾向；东晋时期，中兴的期望，经略中原的构想，使政治一时有望清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过短暂的回暖，但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使政治家们倾心于权力的得失、官位的尊卑和个人荣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双方皆无意识的情况下出现了较大的裂痕，并在双方都不自觉的情况下冷淡下来。文学与政治在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若即若离之后，终于在陶渊明这里开始回归自然——以朴实自然的笔触描绘自然的和谐与秀美，抒写真实自然的人生情怀。

三

魏晋文学与政治之关系，超不出文学与政治的一般关系和普遍规律的范畴。但是，由于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且极具代表性的时期，它经历了由乱而治又由治而乱的历史进程，也走过了由分而合又由合而分的历史轮回。儒家思想统治的坍塌，道教的蓬勃兴起，佛教的广泛传播，玄学的流行，清谈之风的炽盛，个性意识的觉醒，共同奏响了战国之后又一次思想解放和文化重建的奏鸣曲，揭开了文学自觉和独立的历史序幕，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观念都进入了自觉的时代，文学由经学、史学、哲学的附庸而独立成军，挺立时代潮头，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时代，影响着社会，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百姓。

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极具典型意义。这一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政治对文学的影响

或直接而有力，或间接而软弱，或曲折而迂回，文学对政治的影响，则因社会政治环境、思想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鲜明地表现出魏晋文化风貌。但总的来说，文学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表现得比较有限，比较平和。尤其是西晋以后，文学创作对政治的关注已经到了微乎其微的程度，许多重大的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历史事件，很难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找到它们的影子。人们常说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但是，从两晋文学中人们却难以找到这样一种感觉。尽管这一时期的作家胸中常有块垒，常常多有愤激和不平，甚至许多作家死于非命，但平和却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基调。

建安时期，社会由治趋乱，诸侯争雄，鼓角争鸣，风云激荡。文学家生当此时，自当慷慨激昂，梗概多气。但是，这一时期的作家，除曹操鞍马间赋诗，颇多苍凉之气，蔡琰自述不幸遭际，满是愁苦悲愤外，其他作家的文学创作都较少激烈之语，表现比较平和。迄于正始，司马氏和曹氏暗中角力，尔虞我诈，阴风惻惻。何晏等正始名士身不由己，置身党争。尤其是何晏，身居曹爽阵营核心，冲锋陷阵，义无反顾。但他的作品却不像他的为人那样咄咄逼人，盛气凌人，而是在激荡中保持平和，平和中充满忧虑。他有一首五言诗，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种心境：“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阮籍等竹林名士虽然多是政治热心人，但由于生当“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魏晋之际，他们大多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策略，对政治、功名等敬而远之。阮籍“屏于田里”，嵇康“灌园于山阳”，山涛“隐身不交世务”。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阮籍和嵇康，不仅十分平和，而且慎言慎行，“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喜怒不形于色”。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多平和之言，

而少慷慨之气。至于太康诗人,则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就更为平和了。到了东晋陶渊明,吟咏自然,描摹山水,用情田园,抒写性情,成了文学创作的本色,气色更为平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心境,这样一种情怀。

建安以至东晋末年的政治,可用惊心动魄惨烈悲壮八个字来概括。这样一种政治情势,对文学家的心灵和创作无疑会产生极大的震撼,影响自然不可小视。无论是建安作家的“梗概多气”,还是正始名士、竹林名士的平和慎言,也无论太康诗人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还是陶渊明的恬淡自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当时的政治情势的影响,和当时的社会政治有着不解之缘。在平和与自然的背后,折射出高压政治和险恶的社会文化环境。如果是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时代,一个可以自由地发表个人的政治见解的时代,一个不必忧虑因偶尔失言而遭受牢狱之灾甚或掉脑袋的时代,作家们大可不必讳言讳行,而是完全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痛快淋漓地抒写个人情感,自由大胆地表现社会生活,甚而可以借助文学的形式,对当时的政治来一番富于激情的、充满个性色彩的评点。但是,当时的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所以,他们只好深掩自己的政治热情,把对社会、政治、时局的看法,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放言”对许多人来说只是一种奢望。从魏晋作家看似平和的作品中,不难看出政治之手对文学的强力影响。

魏晋时期政治斗争的悲壮惨烈,客观上造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弱势状态;而文学的弱势状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文学对政治的影响是怎样的软弱。当然,文学的弱势,不能完全归咎于政治斗争的悲壮惨烈。魏晋时期玄风大畅,佛教和道教的广泛流行,品评人物之风炽盛,以及达官显宦和士